

从文明交往视域解读希腊化时期中东城市

车效梅¹, 续亚彤²

(1.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0; 2. 山西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 山西 临汾 041000)

摘要: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3世纪,伴随着希腊-马其顿人扩张,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与融合拉开序幕。希腊-马其顿人对城市的热衷,不仅使中东原有城市繁荣发展,一批新城市也在中东拔地而起;不仅出现了“国际性”都市,而且在城市文明中出现自治、新城市形态、市政和民间组织等新元素;城市的建立不仅确保了扩张战争胜利的果实,促进了城市贸易发展、经济繁荣,而且推动了东西方文明第一次大融合、大创新。希腊化时期城市化运动缩短了昨天与今天的距离。

关键词:文明交往;希腊化时期;中东城市;城邦制;托勒密王朝

中图分类号:K3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4)01-0077-07

从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3世纪,在希腊-马其顿人控制和占领地区,出现了一场城市化运动。该运动东起地中海,西到锡尔河、印度河流域,数以百计的希腊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以这些城市为中心,形成人类历史上东西方城市文明的第一次交流与融合。“亚历山大东征初步打开了古代世界的边界,改变了希腊和亚洲世界,结束了希腊的古典时期,进入了希腊化时代。从此,没有任何群体能够孤立于世界政治与文化的潮流之外。显然,这种现象会导致最初的困惑与焦虑,但最终却发展了世界公民的概念。”^[2]由于亚历山大认识到城市对自我荣耀和扩张其统治的作用,所以大力建立和发展城市。

一、希腊化时期城市的发展

中东地处三洲四峡五海之间的海路交通要道,且物产较为单一,发达的地区贸易和国际贸易是中

东历史发展的突出特点,并促进了城市的产生与发展。世界最早的城市出现在9000多年前的巴勒斯坦,即杰里科。在上古时期,中东不仅出现了众多的历史名城——埃利都、乌尔、乌鲁克、底比斯、巴比伦、亚述城、尼尼微等,而且一度执当时世界城市文明之牛耳。如公元前7世纪的尼尼微,是世界上最大城市,占地1800英亩^[3],以巨大建筑著称,神庙和王宫规模宏伟^[4]。伴随希腊人入侵,中东城市文明中增添新元素。希腊-马其顿人的入侵给中东城市带来了空前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批新城市拔地而起。作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城市建立者之一”的亚历山大^[5],在征程中为保卫战略要地、监视被征服的广大地区,但也可能是为促使他的希腊人与东方人和谐共处之理想的实现,建立大量城市^[6]。亚历山大在埃及的尼罗河入海口,亲自遴选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亚历山大城址,这是他在东方建立的第一座城市。罗马时期传记作家普鲁塔克认为亚历山大建立了70座以上以他自

收稿日期:2014-0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SS013);2013年度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2013323)

作者简介:车效梅(1964-),女,山西翼城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己名字命名的亚历山大里亚城。但一般人认为有 20 座左右,主要在底格里斯河以东^[5]。其中影响最大是公元前 331 年建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距离最远的在公元前 329 年建在两河地区的索格底亚那。

亚历山大后继者也热衷于建立城市,最突出的是塞琉古王国,该王朝统治版图最大时从赫勒斯滂海到印度河。塞琉古王朝城市主要集中在从两河流域到东海沿岸地区,特别是塞琉古王朝统治重心的北叙利亚,“许多希腊人、马其顿人定居于此,以至那里成为第二个希腊。”^[7]塞琉古王朝建城 280 座左右^[8]。其中,塞琉古王国前三位国王(公元前 312 年到公元前 246 年)建城最多。仅塞琉古一世就建 9 座塞琉西亚、6 座安条克、5 座罗得西亚、3 座阿帕米亚、1 座斯托拉东尼。安条克(Antioch)及其港口塞琉西亚·皮埃里亚(Seleucia Pieria)、阿帕梅亚(Apamea)、劳迪西亚(Laodicea)都建于公元前 300 年左右的塞琉古一世时期,它们都有着大约为 367 英尺×190 英尺(约 112 米×58 米)的街区。底格里斯河边的另一个塞琉西亚城,据普林尼(Pliny)称有 60 万人口^[9]。连巴勒斯坦这片不大的地域内,也建起过 30 座新城^[10]。

在埃及,除亚历山大里亚以及古老的希腊人殖民地瑙克拉提斯以外,托勒密王朝只建立一座命名为托勒迈斯(Ptolemais)的希腊城市。在红海沿岸南至索马里一线,有一连串的以托勒密王朝命名的城市和移民地,是为通商和猎象而建立的^[6]。

新建立的城市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军事移民地,一类是所谓的“Polis”。二者在内部组织上区别不大,都是以希腊城邦为模式。二者的主要区别在自治权上,军事移民地从属性强,土地由国王支配;“Polis”自治性大,有自己支配的土地。二者地位是发展变化的,大部分军事移民地后来都发展成为“Polis”。“军事移民地向‘Polis’的演化是塞琉古王朝伟大成就之一。”^[7]

经过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努力,希腊式城市已遍布于以东地中海为中心的欧、亚、非大地上。现在已知的移民地名字有 275 个,其实际数目超过 300 个^[8]。

第二,“国际性”的大都市出现,希腊化世界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形成。在当时“国际性”大都市中,最引人注目当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奥伦特河畔的安条克、底格里斯河中游的塞琉西亚和小亚的帕加马。亚历山大建立的城市居民主体是希腊

雇佣军、不宜服役的马其顿人和当地人,他们一起构成城市第一批定居者^[12]。安条克城包括犹太人、叙利亚人和其他民族人等 50 万居民。塞琉西亚建城不到 50 年,城中居民就达 60 万^[7]。由于它地处东西方商路交汇之处,因而商业中转贸易十分繁荣,故有人认为它是塞琉古王国的“第一商业都市”^[13]。帕加马以其宙斯大祭坛、奢华宫殿、藏书 20 万卷图书馆、希腊化世界最大体育馆以及特产羊皮纸等而闻名于世。正是由于藏书丰富图书馆和帕加马国王对纯正希腊风格爱好,该城市在希腊化时代末期成为希腊散文修辞学中心。一位史家情不自禁赞道:“在半个世纪中,帕加马曾是希腊文明中最美之花”^[9]。

在亚历山大里亚,有希腊人、马其顿人、犹太人、波斯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非洲黑人以及埃及本地人,总人口为 40 万~50 万,规模是雅典的 3 倍^[9]。公元 1 世纪罗马著名的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写道:“整个亚历山大形成一个街道网,骑马和乘车都很方便。最宽街道有两条,每条街道有 100 尺宽,彼此交错成直角。城中最壮丽的是公共庙坛和王宫。这些宫殿占全城四分之一到四分之三。王宫一部分就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博学园,里面有游览场所、集会厅堂等。”^[14]随着众多博物馆(博学园)、图书馆在城市中的建立,在这里“博物馆和图书馆跃居比生活和经验更重要的地位,搜集与分类成为智力活动的主要途径。于是,在这个各种思潮的组织者和整理者们的时代,博学的思想家们都汇聚到亚历山大城的大图书馆来了”^[4]。因而,公元前 4 世纪到公元前 1 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无愧于其地中海文化中心的美誉。此外,亚历山大里亚还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阿拉伯的香料、塞浦路斯的铜、埃塞俄比亚和印度的金、不列颠的锡、努比亚的象和象牙、北爱琴海与西班牙的银、小亚的地毯、中国的丝^[15],甚至印度的胡椒^[16],都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由于对外贸易发达,船只往来频繁,“以这个城市为基地的船队,同远在印度和非洲海角的顾客进行交易”^[17]。托勒密政权将埃及富饶闻名的农业生产——如大麦、小麦和纸草——推进至前所未有之水平^[18]。人们迫切需要有一座指引船只靠岸进港的灯塔,由此产生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

第三,原有城市的复兴与繁荣。在东地中海,塞琉古王国中被称为“Polis”的许多城市就是在小亚希腊人旧城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7]。在巴比伦不仅建立一座希腊式的剧院,而且为了国际贸易建立

大量的金融银行机构。如托勒密二世公元前 3 世纪占领阿卡,并改名为阿卡-托勒梅斯(Ace-Ptolemais),该城市经济繁荣。以弗所地处东西方陆地商路一端的终点,是小亚沿岸最大的城市。瑙克拉底斯是希腊移民建立的据点,此时已发展成希腊式城市,其居民主要是希腊人,多从事工商业活动,享有选举市政长官和议员的权利,市议会有制定法律和自铸钱币的权利。这些老城市一方面为新城市输送人员、提供示范,另一方面推动城市化进展。这次城市化运动在公元前 2 世纪以后随着希腊-马其顿人统治结束而结束,但城市化运动中建立的城市迄今仍屹立在地平线上。

二、希腊化时期城市的特征

一代新文明必然有自己的城市,一代新城市自有其特征,希腊化时期的中东城市特征鲜明。

第一,城市的自治与从属。希腊化城市引进希腊城市社会、政治概念——“城市自治团体,不是通过宗教义务和家族联系在一起,而是通过契约关系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确定范围优先选择一个定居点生活。”^[20]这些城市在国王统辖之下,具有一定处理内部事务权力。城市每年要向国王交纳一定数目贡金,接受国王代表监督,有时还要接受国王派来驻军和首脑任命。国王一般不干涉城市内部事务,对城市不发布强制性政策。塞琉古国王安条克三世曾写信给各城市表示,如果他的命令违反法律,它们尽可置之不理,而只假定那是由于他无知而作的处置^[21]。国王是法律之源,其决定作为法律通令全国,但设法使自己的命令与城市的法律相一致^[13]。由于新城市自治权、土地、建城费用以及一定时期的免税由国王提供,因此新建城市与国王关系更紧密,新建城市对国王的依赖性削弱了其本身的自治性。

城市在形式上设有希腊“城邦”机构与制度,一般有公民大会、议事会。公民由希腊人与马其顿人组成,其他民族人无权参与城市事务,他们是居民而非公民。公元前 3 世纪的托勒迈斯城,出现了“国王的大使”,这意味着在国王眼里,此城的自治政府似乎还有点主权国家的影子^[13]。但是,不管这些城市拥有多大的自治权力,它们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政治从属地位,城市既是国王统治下的基层单位,也是维持、巩固国王统治的一种工具。

第二,城市新形态确立与初步发展。希腊式城市形态特征是在希腊式君主统治下,强调君主建筑

空间位置、公共建筑与城市设计一致性。“规划伊始,每一座城市都设计有严格意义的中心广场,神庙和市政建筑。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型公共工程有计划的系统化建设。”^[17]建筑物基本是希腊式,但也吸收东方拱形、平面屋顶等建筑风格^[22],华丽的科林斯柱头、科林斯与爱奥尼亚式的混合型柱头取代单调凝重的多利安式。如亚历山大按当时希腊城市模式规划,“主要特点是突出直线条,绝大部分街道笔直,纵横交叉成直角”,全城分 5 个区,“以开头的五个希腊字母命名。”^[23]居民分区聚族而居,希腊人和外国人住东城,埃及人住西城,犹太人住戴尔塔区。该城既保有埃及文化,又有希腊文化、犹太文化,形成诸种文化并存、互渗的多元格局。

第三,市政和民间组织出现。希腊人引入或保持了他们熟悉的城邦制度,这些城市大都享有一定自治权,设城市公民大会、市议会,选举市政官员,有的还自铸货币。自治城邦虽然名义上仍隶属于王国中央政权,却已突破单纯作为政治中心的那种东方城市模式,城市官员的主要任务转为市政管理、举办公益事业。帕加马城官员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水的供应与公共厕所。许多城市有市立医务组织,个别城市还有医务学校,医生薪水由城市支付,他们对病人不分贫富、一视同仁^[9]。在新城市里,由于人口混杂和传统缺乏,民间组织在协调社会成员关系方面担负重要角色。民间组织的结构和运行程序与城市制度相似,但它们的成员既包括希腊人,也包括当地人;既有自由人,也有奴隶;既有男人,也有女人^[6]。

三、希腊化城市建立的意义与影响

第一,城市的建立确保了战争胜利果实。亚历山大以及马其顿国王之所以建立城市,是因为他们放弃利用东方人政策,唯一可依赖的只有自己同胞希腊-马其顿人,而希腊-马其顿人与当地人相比是少数,只有集中才能进行有效统治,因此在战略要地和商路津渡建立城市刻不容缓。同时新帝国或王国建立后,统治者需要新城或商业、文化中心,这也促进新城市建立。同时,希腊-马其顿统治者有文化优越感,想通过希腊文化传播对当地人产生影响。可见,建立希腊式城市不仅是出于军事统治考虑,也是文化征服需要。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出于共同统治需要,都参与和推动城市化运动发展^[6]。事实上,这些目的都基本实现。一是城市享有一定自治权,

但反叛国王的并不多;二是城市对被征服的当地民族起到一定震慑作用;三是城市中的希腊-马其顿人给国王们提供取之不竭的人才之库、兵力之源;四是城市成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24]。

第二,城市的建立促使贸易发展、经济繁荣。由于物产相对单一和过境贸易繁荣,中东地区外贸发达。“无论某个城市在某个地方得以建立起来的初始原因如何,一旦它建立了起来,便会形成属于自己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25] 早在上古时期中东的城市网络以一种渐进的形式沿地中海欧洲海滨延伸,并以一种网格状形式拓展到欧洲内陆。该网络的中心是波斯帝国和它的都市,西边被一些小的城市联盟和联邦所包围,如希腊人、迦太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的城市联盟,再远就到达伊比利亚、凯尔特、色雷斯和西徐亚部族王国的本土城市。就欧洲边缘而言,沿地中海殖民的最重要机构之一是希腊人的海上同盟。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继续享有制海权,同时刺激了希腊殖民活动的复兴^[26]。

希腊化时代相对开放的国际大环境和希腊化世界经济重心向东倾斜的交互作用,促使中东城市经济繁荣。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的城市作为新兴的人口中心和经济文化中心,取代了昔日希腊的地位。塞琉西王国拥有出色的东西方转口贸易。伊兹尼克城位于东西方贸易交汇点,中转贸易促使该城市得到迅速发展^[19]。在埃及伴随希腊商人而来的商品货币经济因素,开始嵌入埃及传统的经济结构。当地盛产的农产品成为输往地中海世界各地的热门商品。甚至王室作坊的生产,也在很大程度上面向国外市场。埃及商业势力已扩至北非沿岸、爱琴海、小亚细亚、黑海、叙利亚、印度甚至东非沿海。埃及从当时十分活跃的过境贸易税收中获益甚丰,有时高达20%或30%^[27]。

城市建立促进商路开通,商路开通促使城市繁荣。伴随着希腊人的商业精神在地中海世界四处撒播、生长繁育,以这些城市为点编织起纵横交错的商业流通网络。仅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商路就有三条。北路从巴克特里亚都城巴克特拉沿阿姆河而下,到里海、黑海。中路有海路和陆路组成,海路从印度到波斯湾,溯底格里斯河而上,抵塞琉西亚;陆路从印度经兴都库什山,伊朗达塞琉西亚,水陆两路会合,西至安条克,再至以弗所。南路从印度沿海到南阿拉伯,经陆路到培特拉、安条克、大马士革、亚历山大里亚等地。如果没有这些商路,就没有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等国际性商业城市的繁荣^[16]。

第三,城市的建立推动东西方文明第一次大融合、大创新。城市孕育文化,文化使城市不朽;城市传播文明,促进文明融合。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是城市3个基本使命。对异族的大规模征服,必然导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广泛交往、融合与同化。伴随亚历山大帝国之后的新王国内希腊因素和亚洲因素融合,城市既成为传播希腊生活方式、保持希腊风格优势的方法,又成为征服者与土著互相影响、创新发展的中心。希腊化文明如果没有城市是不可思议的,东方各民族正是经由这些希腊化城市及其居民,才能接触到希腊文化的精华与真谛。同时,希腊人也是通过这些城市深化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汲取东方多种知识和技艺。一方面是典型的希腊式神庙祭坛、议事厅堂、露天剧场、园林雕塑等公共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另一方面又有东方的宗教巫祝、文化学术渗入希腊人的生活。更引人注目的是,希腊化时代最大的希腊文化中心已不在希腊本土,而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西亚的帕加马、安条克、塞琉西亚^[28]。

在新城市环境中,犹太人、希腊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等大批侨民共同生活。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成千上万的希腊商人、行政官员、各种专业人员涌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建立的城市,这些城市都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如1962年发现的位于阿富汗喷赤河与考恰克河交界处的巴克特拉(当地人称阿伊哈努姆)遗址,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缩影。这里既有希腊神话、建筑、语言和格言,又有阿黑门尼德式建筑、神祇,阿拉米语和佉卢语,祆教、印度教、佛教也同时存在。它的艺术为希腊风格所支配,但同时也受到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影响^[29]。国际化氛围促进文化和科学快速发展,东方文化与希腊文化交流汇合构成希腊化文化两个基本特点:多元与统一。在多元与统一过程中,城市作用突出:一方面文明中心从地处内陆的帝国首都和城市(如底比斯、巴比伦)转移至地处欧亚大陆交界处、波斯湾与地中海交通便利处的新兴大城市、首都,如安条克等;另一方面新兴城市发展成为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中亚历山大城为典型代表。

融合与创新成为多元与统一的具体表现。在中东第一次大规模引进希腊文明时,以西亚北非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向希腊输出也空前加强。结果导致纯粹的东方文化和希腊文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融合型的文化。其具体如下:

第一,在政治和司法方面,希腊化国家政治体制

带有更多东方色彩。亚历山大将首都设在波斯旧都巴比伦,接受了东方的王权和君主的神化传统。亚历山大以“阿蒙之子”自居,托勒密国王安条克四世自称“埃皮法内斯”(显应之神),该王朝君主的祭拜庙遍布全国各地^[28]。就城市而言,西亚城市仍然保留自治地位,市政官员、财政官员和将军直接向国王负责,君主们竭力模仿东方统治者言行。同时,希腊征服者深悉仅靠军事威势不足以长治久安,尚须倚重东方原有统治人物的支持。所以他们执政期间大量吸纳波斯人、叙利亚人、埃及人进入国家机构任职。埃及统治机构的权力分配往往是:行政(政府官员)、军事(军官、士兵)方面,以希腊人为主,埃及人为辅;宗教(祭司)方面,则以埃及人为主。这样,统治集团的合流,奠定了希腊化东方各国政治秩序的基础。如贝罗苏斯著的《巴比伦史》,把塞琉古帝国视为两河君主传统和文明的传人,他与马尼托所著的《埃及史》完成了马其顿-希腊统治者与近东政治传统的同一化过程^[30]。埃及存在着希腊城市法和土著民族法两种法律,二者相互影响,但前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当地希腊城市中,完全通行自己的法律。希腊移民引入行之有效的商务法规,同样也在非希腊裔居民(如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中流行^[28]。

第二,在宗教与文化方面,希腊化时期的中东城市不仅是统治者在被征服地区设置的统治中心,而且也是诸多民族相互交往的辐射点,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东西文化的融合奠定了基础。尽管中心城市是“沙漠”中的“绿洲”,但它们对周围地区以及混居在一起的当地人产生影响,就连宗教传统极为保守的犹太地区也都一度受到希腊文化冲击。希腊化君主建立希腊神庙,但对东方宗教也相当尊崇,据说亚历山大下令修复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庙,托勒密王朝也重修埃及许多神庙。不仅如此,在希腊的神灵中出现了完全来源于埃及的贝斯神,它职掌免除灾难、保佑妇女生育^[31]。托勒密王朝更是创立了集埃及、希腊因素于一体的塞拉皮斯崇拜,作为王朝保护神,并于公元前 3 世纪传播海外。特别是世界性的一神教——基督教的产生,其后出现的伊斯兰教也是这种文明交往的产物。最终,在这种全面文明对话和交往的基础上,中东文明圈开始形成、拓展并延续至今。

希腊化时期是中东语言发生重大转折时期,即由繁难的早期古代语言(埃及文化和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向字母文字(如希腊语和阿拉米语)全面过

渡时期。有些东方人学习希腊语,并以此来写本国历史。埃及文化、犹太文化、波斯文化、巴比伦文化以及其他文化都受益于希腊文化影响,如《旧约圣经》在亚历山大里亚城被译为希腊语,显示希腊文化渗透。但是,希腊人在传播自己文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东方文化影响,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汇合首先在城市中开始,新的希腊化文化在城市中形成,一种新型的希腊语言即柯因内语成为整个中东共同语。如法老时代的埃及文学《七十子希腊文圣经》,受到古代摩西文本影响的希伯来圣经的希腊译本。东方人芝诺创立并风行于该时期的斯多噶派哲学,他杰出弟子都来自亚洲的希腊式城市。

城市是培养新文化人才的学校。许多名流雅士多出自这些新建城市,高产作家狄戴姆斯、几何学大师欧几里德出自亚历山大里亚城,天文学家塞琉古出自塞琉西亚城,数学家阿波罗尼乌斯出自帕加马城,历史家阿波罗多鲁斯出自阿特米塔城。他们都促进了希腊化文化的形成。“亚历山大里亚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国际化城市,是希腊文化的超级熔炉。”^[18]亚历山大图书馆设有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园和图书馆。环地中海世界的哲学家、数学家、医生、动植物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艺术家、诗人等,由于受到舒适且催人上进的气氛、极好的设备、免费的膳宿和令人羡慕的薪酬的吸引而纷纷来到埃及^[32]。

第三,在艺术与史地方面:西亚艺术吸收了希腊艺术风格,如货币上运用希腊图案,建筑物上则出现希腊式圆柱(巴比伦尼亚的尼普儿的宫殿即为一例)。如釉陶(Faience)最初是埃及人的创造,埃及人用它来制作珠子和其他小装饰品^[33]。至公元前 7 世纪中后期,随着希腊与埃及之间交往的日益增多,在罗德斯和诺克拉提斯便相继出现生产希腊釉陶的作坊。在雕像领域,希腊人虽曾受惠于埃及的比例标准(Proportion of canon),但最终越来越接近于真人的比例,从而反映出希腊文化中的人性因素在文化选择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34]。

第四,在经济和天文学方面,托勒密王国的国王是埃及所有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但私人土地制有明显发展。在塞琉古王国,出现征服者的大土地制和城邦公民土地制。巴克特里亚国王弥兰陀创立一种希腊纪元。埃及的历法对希腊产生重大影响,希腊采用埃及太阳历,一年 12 个月,每月 30 天,另加 5 天。

第五,在城市规划与市政方面,在希腊化城市规

划中,既有城市的雄伟化,建筑群的对称性和成轴性不断强化;又有东西方因素交融的明显显现。如在许多城市布局中,总有一处建筑物是重心,而这种布局在纯希腊式城市是看不到的。因为希腊规划体现了民主的色彩,房屋基址趋于一般大小,即使公共建筑物也与街道网络充分协调,没有任何一部分超出其他部分。如亚历山大的埃及神伊西斯安排了神庙^[35]。这座神庙,按照中东的传统,建在一座人工的台基上,给人一种居高临下俯视整座城市的威严感。亚历山大城整座城市的规划显示了希腊和埃及建筑传统的结合,开希腊化城市规划之先河。这样,东方一些建筑形式与希腊式城市浑然一体。在它们影响之下形成的、以希腊艺术之形表达佛教精神之实的犍陀罗艺术,就是希腊化文化中的一枝奇葩。它接通了从希腊到中国的道路。我们祖先对希腊造型艺术了解首先来自印度的佛教艺术。

第六,在民族融合方面,希腊文化以移民为载体向东方传播。希腊化时代出现移民浪潮,汤因比称之为“希腊人的第二次殖民化时期”。由于移民中妇女比例较低,大批希腊男子与东方妇女成婚。亚历山大大帝娶波斯贵族女子为妻,在印度战役后他安排了3 000名士兵和波斯妇女举行大规模的集体婚礼。血缘和姓氏的混杂改变了希腊人含义,“谁有希腊的思想观点,不论是什么国籍都可以是希腊人”^[11]。在西亚,一些家庭往往出现姐妹使用亚洲名字、兄弟使用希腊名字的现象。这是由于一些希腊定居者娶本地人为妻,遵照当时习俗,儿子多以父亲的语言命名,女儿名字则从母系的缘故。在埃及,相同家庭里也同样存在希腊和当地名字^[16]。

四、结 语

总之,希腊化时期的中东城市成为世界城市文明史中的一支奇葩。由这些城市所产生的“希腊化”文化经由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文艺复兴时的西方人传到今天,博瑞说,“人们已经对希腊化时代做出这样的评论,认为它在许多方面比古典时代希腊人离今日之世界更为接近”。可见,正是希腊化时期城市化运动缩短了昨天与今天的距离。

参考文献:

- [1] 车效梅. 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 Menahem M. Jewish history and thought: an introduction[M]. New York: KTAV Publishing House, 1991.
- [3] Tertius C, Gerald F.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rban growth[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 [4]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M]. 宋俊岭, 倪文彦,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 [5] Tam W. Alexander the great: Vol. I[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
- [6] 杨巨平. 城市史研究: 第7辑[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2.
- [7] George W. Hellenic history[M]. New York: Macmillan, 1939.
- [8] Max C. A history of the Greek world: from 323 to 146 BC[M]. London: Methuen & Company Limited, 1932.
- [9] 威尔·杜兰. 世界文明史: 第7卷[M]. 台湾幼狮文化,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
- [10] 斯皮罗·科斯托夫. 城市的形成: 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M]. 单皓,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 [11] 阿巴·埃班. 犹太史[M]. 阎瑞松,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 [12] Diane W. Western civilization to 1648[M]. New York: McGraw-Hill, 1990.
- [13] John B.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 [14] 何芳川, 宁骚. 非洲通史: 古代卷[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15] Edward M. World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M]. New York: Norton, 1974.
- [16] Tam W. Hellenistic civilization[M]. New York: Classical Association of the Atlantic States, 1961.
- [17] 乔尔·科特金. 全球城市史[M]. 王旭,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18] Michael G. From Alexander to Cleopatra: the hellenistic world[M]. New York: Scribner, 1982.
- [19] Michael R, Bruce E. Cit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M]. Sacramento: ABC-CLIO, 2006.
- [20] Blake G, Lawless R. The changing middle eastern city[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 [21] John B. The Oxford history of classical world[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2] Welles C. Alexander and the hellenistic world[M]. Toronto: A. M. Hakkert, 1970.
- [23] 莫赫塔尔. 非洲通史[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5.
- [24] 周义保, 张南. 罗马帝国城市化初论[J]. 史林, 1991

(7);58-64.

[25] 斯皮罗·科斯托夫. 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M]. 单皓,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6] 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M]. 王春法,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27] 爱·麦·伯恩斯. 世界文明史[M]. 罗经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8] 沈坚. 关于希腊化时代的历史考察[J]. 史学集刊, 1992(3):57-62.

[29] 彭树智. 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0] 彭树智,王铁铮. 中东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31] 刘文鹏. 古代埃及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2]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M]. 董书慧,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3] Robert C, Pierre D. East Greek Pottery [M]. London: Routledge Readings,2003.

[34] Eleanor G. The proportions of Kouroi[J].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1978(9):468-470.

[35] 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Book III[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

[36] 格鲁塞. 从希腊到中国[M]. 常书鸿,译.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

Interpretation of middle eastern cities in Hellenistic period
from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CHE Xiao-mei¹, XU Ya-tong²

(1. School of History,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0, Shanxi,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s,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nfen 041000, Shanxi,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reece-Macedonia expansion, the un-precedent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n human history started from the late 4th century BC to the 3th century BC. Thanks to the Greece-Macedonia’s enthusiasm on cities, not only did original cities flourish, but also a number of new cities sprang up in the middle east. What’s more,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ity, the new elements, such as autonomy, new urban form, municip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ppeared in urban civilization. Meanwhil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ities not only ensured the victory of the expansion war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rade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but also boosted the first great fusion and innova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urbanization movement in Hellenistic period shorten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past.

Key words: civilization exchange; Hellenistic period; middle eastern city; polis system; Ptolemaic dynasty

